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文物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要览

REVIEW OF THE RESEARCH INTO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考古学专刊
乙种第三十七号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3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印制 王少华
责任编辑 张庆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12
ISBN 7-5010-1480-9

I . 中… II . ①中… ②中… III . 文明起源 (考古)
—中国 —文集 IV . 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2528 号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 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 32.75

2003 年 12 月第一版 200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480-9 / K·720 定价: 110.00 元

**本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
出版基金资助**

ARCHAEOLOGICAL MONOGRAPH SERIES
TYPE B NO. 37

Review of the Research into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 AN ENGLISH ABSTRACT)

Edited b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Research Center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China · 2003

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

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近八十年来，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但迄今为止，尚缺乏对这大量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的系统收集与整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一书，填补了这一空白。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既是一部专题研究工具书，又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反映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与观点的学术著作。该书全面收集、摘编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各种论著（约八百篇），内容包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宏观研究与理论探索，对文明因素中诸如城、王墓、金属器、文字、礼制建筑等的产生与发展的考察，中国文明形成的轨迹，中国各主要区域的文明化进程，中国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模式等等。并将摘编的约八百篇论著分为三十个研究专题编排，集中展示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于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形成，推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刘庆柱

专家推荐意见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当前学术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本书收集了 20 世纪发表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分类摘编专著和论文约八百种，共约六十万字。该书对于全面了解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以及进一步探讨文明因素的发展和模式，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安志敏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也是世界古代史的重大研究课题。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学术界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形成了几十部论著、千余篇论文，提出了许多问题和研究观点。但是，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综合性著作将这些著作的观点或提出的问题进行系统整理和集中展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填补了这一空白。

该书汇集摘编了 20 世纪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各种论著与观点，涵盖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学者进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各种学术资料，有集万册于一书之便。该书还将摘编的近八百篇论文分为三十类，并以章节的形式分类编排，以便于读者检索和全面了解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于准确地认识中国文明起源、进一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建议尽早出版此书，以推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开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任式楠

前　言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这个词汇出现较早。例如，《易经》中有“天下文明”（《文言》），“文明以健”（《同人》），“其德刚健而文明”（《大有》），“文明以止”（《贲》），“内文明而外柔顺”（《明夷》），“文明以说”（《革》）等语词，《礼记·乐记》中有“是故情深而文明”，《尚书·舜典》中有“濬哲文明”等语词。《辞源》归纳中国古代应用“文明”一词的含义，主要是指“文采光明、文德辉耀”和“有文化的状态”^①。

我们现今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中的“文明”一词的含义，主要是在20世纪初期从西方引进的，翻译于西文中的“Civilization”一词。1983年，夏鼐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② 如果按照这个定义，那么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最早探索，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方法来探索中国的古代社会。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序中指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走向。”“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纸。”“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

^① 《辞源》（修订本）1356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②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8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红种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①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殷商社会制度，但他研究的目的是要写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中国续篇，这表明他实际上已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所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应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先导。

自 20 世纪 20 年代末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 1928 年至 1976 年的准备期（资料积累期），1977 年至 1985 年的初步探索期，1986 年至 2000 年的全面开展期。2001 年以后，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开展为标志，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一）1928 年至 1976 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在 1928 年至 1976 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大体上处于资料积累的初始阶段。1928 年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可作为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其中又可以 1959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为探索夏文化而开展的豫西考古调查为标志，将这一时期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这时期的前一阶段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为探索商代文明，对安阳殷墟进行了十年十五次发掘。发现了商代后期王都的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群、甲骨档案库、王陵和千余座小墓或祭祀坑，出土了一批反映商文明特点的甲骨文、青铜礼器、兵器和车饰等。使学术界开始认识到商殷时期已经出现了国家。后来，曾多次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李济，依据十五次发掘安阳殷墟的收获，探讨了中国文明的开始和特征，于 1957 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了《中国文明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Civilization*）。李济在该书中指出：安阳殷墟表明的商文化，具备了熟练的铸铜技术、独立发展的文字系统和一种复杂而有效率的军事组织。这文化表现出物质生活的富庶，高度成熟的装饰艺术，明确的社会组织和对祖先极高崇拜的神权政治。他认为所有伟大文明的发生都是于文化接触的结果，殷墟商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开始阶段。

另一方面是追寻殷墟商文化的源头，在山东、河南等地探索龙山期文化遗存。至 1939 年，梁思永在提交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议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中，总结了龙山文化的特征，并将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他认为龙山文化与殷文化在十个方面有着共同点，后冈二层是豫北殷文化的直接前

^①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上海联合书店，1930 年初版。

驱。该文实际上点明了龙山文化时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在这时期的后一阶段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主要是围绕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来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以及探索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

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至1973年全面揭露出一座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基址，以及一批铜器、玉器和大型石磬等，并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四期，宫殿基址、铜器和玉器属第三、四期。这些发掘资料公布后，围绕夏文化探索或早商文化研究，学术界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展开了初步探索。

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伴随着对各地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及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而展开的。其中，对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及有关问题的讨论，是引发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蓬勃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 1977年至1985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如果说1977年以前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主要是考古学上的资料积累。即通过对安阳殷墟的发掘，揭示灿烂的殷墟商文明；通过对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初步的大面积发掘，追溯早商王室文化，提出了探索夏文化、夏代国家的课题；通过对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和各地龙山文化的考古研究，以及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与确认，探索新石器时代晚期经济形态的变化与私有制的产生等问题；为日后探索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条件。那么1977年以后，则依据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成果，明确地提出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课题。

标志这一阶段开始的研究工作有两项：一项是唐兰对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或称陶文）的研究，提出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另一项是在安金槐率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的夏文化探索过程中，于登封告成镇西发现“王城岗”城址。

唐兰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针对其观点展开了一场有关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的学术讨论。在讨论中，唐兰坚持其观点，主张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文字，已进入了初期奴隶制社会，中国的文明史应从黄帝开始，至今已有六千年左右^①。

这场学术讨论持续至1979年。通过这次讨论，加深了对约距今5500至4500年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尤其是距今4800年至4500年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文化特征、社会性质的认识^②，以及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器刻划符号所体现的远古文明火花的认识^③。而这次

^① 唐兰：《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上），香港大公报，1978年。

^② 参见本刊编辑部：《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及有关问题的讨论》，《考古》1979年第1期。

^③ 邵望平：《远古文明火花——陶尊上的文字》，《文物》1978年第9期。

学术讨论所产生的深远意义，则是在考古学界、史学界播下了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种子，催发了研究者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与地域的深思。

70年代后期对夏文化的探索，是1959年豫西调查后大规模发掘二里头遗址的继续，分别在晋南和豫西展开。1977年春在豫西登封告成镇西发现“王城岗”城址后，于1977年11月在登封召开了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提出了禹都阳城即“王城岗”城址，以及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探索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的问题，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①。这方面研究的深入与展开的讨论，为探索夏文化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同时也启发研究者先后在中原、海岱、长江中游等地区寻找距今4000年以前的城址。所以，登封“王城岗”这一中原地区距今4000年以前城址的首次发现，实际上也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拉开了序幕。

1977年至1985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尚属初步探索阶段，其特点仍然是考古探索为主导，在局部领域展开，并依据日益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提出了要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开始了从理论与具体个案的分析上进行系统研究。这时期形成的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显著推动作用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项：

1.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2. 对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作用的初步认识；
3. 史前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4. 辽西红山文化的新发现及其研究的新进展；
5. 夏文化探索中有关研究热点的形成；
6. 安志敏等人对早期铜器的研究和田昌五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认识；
7. 李学勤提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
8. 夏鼐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系统研究。

其中，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他在理论上澄清了以往对文明概念的模糊认识，明确了解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方法与途径，以及探索的对象与范围，初步解决了中国文明的形成问题。他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二里头文化，至少是它的晚期，是已达到了文明的阶段；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中国文明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这些论述，为以后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在该文发表之后，才开始全面地展开。

^① 参见《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4期。

(三) 1986 年至 2000 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1986 年至 2000 年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开展时期。标志这一阶段开始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苏秉琦全面介入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并提出新的观点。在 1986 年 7 月至 1987 年 10 月的十五个月内，苏秉琦以其七十七岁的高龄，多次接受《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沈阳晚报》、《瞭望》、《人民中国》等媒体记者的采访，先后前往甘肃兰州、内蒙古包头、辽宁沈阳与兴城、浙江杭州、四川成都、山东长岛、山西忻州、辽西牛河梁等地演讲、考察，产生了二十多篇论述，提出了辽西发现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坛、庙、冢”等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的观点。还提出了“要复原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复原中华民族历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的奋斗目标。苏秉琦提出这些新观点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另一方面却极大地促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展开。

198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时任所长徐苹芳主持下组成了文明起源课题组，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地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开展。

1986 年至 2000 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广大学者积极参与，学术思想十分活跃，涉及的研究领域与时空范围空前广泛，突出地展示了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景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史前考古和夏商周考古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先秦史的研究。具体反映以下几个方面。

1. 1986 年至 2000 年发表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大，约有八百多篇。1987 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都在四五十篇以上，并且逐年增加。其中 1996 年有八十多篇，1998 年、1999 年分别达到了近一百篇。其一年的研究论文数量就超过了 1980 年以前的总和。同时还出版了《中国文明起源新探》^①、《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②、《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③、《中国早期国家》^④ 等几部研究专著。对中国文明起源模式的认识，初步形成了以苏秉琦、安志敏、严文明等人分别代表的几种学术研究流派。

2. 1986 年至 2000 年期间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应用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提出的学术观点有许许多多，有些则是对有关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其中，数量较多、形成主流研究取向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 苏秉琦著，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 年；三联书店，1999 年。

^② 李学勤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

^③ 严文明著，科学出版社，2000 年。

^④ 谢维扬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

第一种，主要是通过对摩尔根、恩格斯等经典著作所确定的“文明”、“国家”等概念的理解，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这种研究取向的论文数量所占比例较大。

第二种，主要是与世界上其他几个文明起源中心进行比较研究，或是引进现代西方学者对“文明”、“国家”等概念的研究成果，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三种，主要根据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文化发展的自身特点，来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模式等，提出了许多术语。

第四种，主要是力图通过文明起源研究，解决夏商周三代之前、尤其是解决距今6000年左右至距今4000年左右这一阶段的社会形态与特点等问题。或是通过研究文明的早期发展，解决三代的社会形态与特点等问题。

3. 在1986年至2000年期间，形成了多种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途径。

第一种探索途径主要是通过研究文明因素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如文字、城址、宫殿、礼制建筑、青铜器、玉器、礼乐器、埋葬制度，甚至是王权、神权，以及“王室”文化因素等，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二种探索途径是着重研究文明的本质特征，如私有制、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复杂社会和国家政权机构等。

第三种探索途径是着重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模式和特点，如原生文明、次生文明、文化交流产生文明、多元一统、神权与王权并重、区域文明化进程的特点，等等。

第四种探索途径主要是探索文明形成的动力、机制与背景，如农业发展、环境变化、文化传播、治理洪水、战争、祭祀、对财富的贪欲等对文明形成的作用，等等。

第五种探索途径主要是通过对文献的整理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尤其是探索传说时代的社会状况，力图将文献研究和考古学研究进行整合。

4. 通过1986年以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在前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四种有关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的主流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是因为目前从考古学上能够将中国文明社会形成说得比较清楚的，仍然是二里头文化。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龙山文化晚期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众多的考古发现表明，许多文明因素在各地的龙山文化晚期已经形成。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大致是以中原、海岱等各个主要区域内龙山文化形成的年代为依据。其中，中原地区的陶寺文化开始出现高层次的文化内涵应是一个重要的界线。

第四种观点认为，在距今5000年前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以红山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仰韶文化晚期等发现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为主要依据。

5. 通过1986年至2000年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在宏观上获得了重大进展。

首先是开阔了研究视野。通过比较研究，认识了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通过讨论，各研究者之间得到启发，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形成了共识。

第二，对一些概念加深了认识。如对“文明”、“国家”等概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第三，发现了一大批距今四五千年或五千多年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丰富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内涵。如果说这还不够将中国文明的形成时间向前推进了几百年，那么这至少是将中国的一些文化成就向前推进了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

第四，对几个主要区域（即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的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其中，对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龙山时代形成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分布格局、龙山时代中原的陶寺文化及年代晚于它的二里头文化所显示出来的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作用等，都是不可能被低估的。

第五，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尤其是公元前1万年以来或者是距今6000年以来至秦统一前的社会特征与特点、发展阶段等问题，加深了认识。还形成了有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新的学术体系。即苏秉琦探索提出的中国国家起源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发展阶段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种发展模式，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特点等新的认识。

第六，进一步确立了1983年由夏鼐指明的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文明的认识，并得到举世公认。

第七，确立了中国文明是世界东方最早的文明的论点。

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在21世纪的继续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前面所谈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历程的大致轮廓，在阅读本书各章节内容时可以思索到。

本书尽可能宽地收集了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各种成果。其中，有关研究专著十多部，论文集约六十部，引用各种学术期刊近一百五十种、报业六种，作者约四百余位，各种论文近八百篇，覆盖了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各类研究者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部论文（这方面的内容请详见本书附录一至五）。一些海外作者的论述，译成中文刊发的，我们也尽可能收录；但个别地方刊物上的有关论文，在京实难查找的，不得不遗珠。

在对原文的摘录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吃透原著，全面准确地理解作者表述的含义。尊重作者的论述，尽量摘录原文、原句。但因摘录篇幅有限，在截要摘录或进行编写中难免断章取义。为了弥补可能出现的这方面的过失，我们同时列出每篇被摘编文章的出处，以便读者查阅原文，进一步研究。

为使读者便于使用本书，我们对摘录编写的近八百篇论文（包括专著），按论述的内容或主体内容进行了分类编排，共分为三十类。每类中又按原文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个别影响较大的文章则按发表演讲时的时间顺序编排。每类中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好处，是可以从中窥测该类议题研究进展的历史状况。

为了便于快速地从整体上了解 20 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概况，我们又做了附录一和附录二，即将摘编的全部专著与论文的题目按发表时间（年份）的顺序进行统一编排，并做了索引。这既便于读者通过浏览专著与论文题目来了解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整体发展概况，又可按年份查找欲了解某论文的内容与观点。附录三是专著与论文的作者姓名索引，便于读者查找某一作者的有关论述，也可以从中研究该作者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方面的学术思想的发展状况。

对近八百篇论文的摘编稿进行分类，是我们在编辑本书过程中用功较著的一项工作。其中遇到不少困难，如有的论文的内容含有我们分类中的两类或几类，对此我们则以该论文阐述的主体内容或主要观点来分类。有时也因对原文的理解有误，可能会有削足适履之嫌。对此，敬请谅解。

我们将摘编的近八百篇论文分为三十类，并冠以三十个分类题目（参见本书目录），既是便于我们对近八百篇论文摘编稿的归纳编排，也是为使读者对相关研究内容有系统的了解。从三十种分类题目的名称中可以看出，有的题目的内涵是相当宽广的；有的则与其他分类题目有密切的联系；有的外延很宽，但摘编的论文数量并不多。下面做一简要的介绍。

本书中的三十个分类，按其内涵可归纳为五个方面，即书中的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宏观研究和有关的理论探索，属综论性质。其中，《中国文明起源的宏观研究》收录论文五十八篇（包括专著，下同），主要是在宏观上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述，包括对中国史前史的论述。有郭沫若、李济、夏鼐、苏秉琦等人的 important 论述，也有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座谈会的发言摘录，个别论文因无法归入其他类别，也并在此类中。《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探索》收录论文四十六篇^①。主要包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与形态的理论研究，如佟柱臣、田昌五的相关论述；如何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探索，如苏秉琦、安志敏、童恩正等人的相关论述；中国文明起源

^① 第一部分其他六个分类的内容，有的也属理论探索，但各类的侧重点有所区别。

的模式分析，如严文明、吴汝祚、石兴邦、张忠培等人的相关论述；以及专从某一方面，如王墓的出现、王的兴起、城邦的形成等，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尝试等。《对文明的概念、特征、标志与要素的讨论》收录论文二十六篇，其中既有对“文明”与“文化”的阐释，对城市、文字、青铜器、礼仪性宗教建筑、礼制、“龙”遗迹等因素的讨论，也有对文明特征的分析。《文明起源研究方法与途径的探讨》仅收录论文十篇，这可能是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大都在论述其他问题时一起阐述了，故专题研究论文较少，也反映出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国家起源、形成与早期国家形态及相关理论的探索》收录论文四十六篇，主要是以国家起源与形成为议题的相关论述，也有探讨研究方法的。这种议题的内涵，从某种角度讲，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议题有相同的方面，但议题强调了“国家”概念，所以我们将其从强调“文明”概念的类别中分离出来，单独立为一类，以便读者查阅。个别讨论夏代的论文，因其与“国家”形成结合讨论，故也将它们归在这一类。该类论文中还包括了夏族与华夏族形成的探索，如谢维扬、沈长云、唐嘉弘等人的有关论述。当然，20世纪中探讨夏族与华夏族形成的论文不限于收录本书的这几篇，我们仅是选择了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关系较为密切的几篇论文，这几篇论文自然是不足以反映20世纪探索夏族与华夏族形成的研究状况的。《酋邦问题与文明起源研究》收录论文六篇，都是应用1962年塞维斯（Elman R. Service, 1915~1996年）发展20世纪30年代民族学研究中提出的“酋邦”（指不平等的原始社会制度）一词的概念而形成的有关“酋邦理论”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专题论文。应用“酋邦”理论探讨中国文明起源或早期国家形成的研究成果还有好几项，因其主要议题是探索国家起源或是中外文明起源比较研究等，故将它们归入其他相应的类别中。《中外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收录论文十六篇，其中除进行中外文明进程方面的宏观比较外，还有以单项文明要素如城市起源的比较研究、或年代学的比较研究，也有介绍国外学者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还有提出了经典著作论及之外的第四种国家起源形式等理论探讨的认识。但总的来看，对中外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相对较为薄弱，亟待加强。

第二部分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各种专题研究，属专论性质。其中，《古代环境与文明起源研究》收录论文十九篇，有的从宏观上论述环境对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影响，有的是论述某一地理单元的环境条件对文明起源的影响，还有的是论述洪水与治理洪水对古代文明形成的作用等。这些成果大都是在90年代形成的，作者大都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这说明我国在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中对古代环境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有待更多的学者、尤其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参与。《原始农业与文明起源研究》收录论文十一篇，虽然论题都较为宽大，对原始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如何影响了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还有待深入的探索，但至少已表明对农业是文明起源与发展最主要的经济基础已取得了重要认识。《史前聚落、城与文明起源研究》收录论文九十篇，其

中大都是论述距今 4000 年前的城址与文明起源的，有宏观论述，有对某一区域内城址的论述，也有对单个城址的分析研究，这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各专题研究中讨论最为热烈的一项议题。它反映出距今 4000 年前的城址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中较易把握、可实地研究论证的重要标志之一。《符号、原始文字与文明起源研究》收录论文七篇。一些与论述中国文明起源没有联系起来的原始文字或符号的研究论文，没有收录。部分研究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或称原始文字）的论文，因涉及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的讨论，故收录在第三部分第三节《海岱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中，这里将摘编的这七篇论文单独立为一类，主要是要表明符号、原始文字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早期铜器与文明起源研究》收录论文七篇，一些没有结合中国文明起源等有关问题而单纯研究早期铜器的论文没有收录。将摘编的这七篇论文单独立一类，亦是表明早期铜器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受有关资料和观念的局限，这方面的研究尚待深入。《原始宗教与文明起源研究》收录论文九篇，一些单纯研究原始宗教或史前宗教的论文没有收录。从收录的这九篇论文的摘编内容看，对于原始宗教对文明起源的作用或影响尚未展开深入的探讨。《原始礼制的探索与文明起源研究》收录论文十一篇。礼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之一，也是反映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一项内容，表现在起居、饮食、政务、宗教活动等各个方面，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等。我国对原始礼制的探索是伴随着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而开展起来的，20 世纪 80 年代末才开始引起研究者的真正重视。但近十多年来，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为数不多。原始礼制的形成及其表现形式、其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作用等，都尚待深入研究。《史前战争与文明起源研究》收录论文六篇，数量较少，这表明尽管许多研究者都谙熟“国之大事，在祭与戎”的要义，认识到史前战争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催化作用，但要对史前战争进行实证的研究，实非易事。但已有的这方面的几篇专题研究成果，则表明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史前玉器与文明起源研究》收录论文十七篇，主要是论述“玉器时代”或就此开展的针锋相对的讨论。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正式提出“玉器时代”并进行全面论证，是在辽西东山嘴、牛河梁等地发现大批红山文化玉器和浙江余杭反山、瑶山祭坛墓地发现大批良渚文化玉器之后开始的。从东汉袁康在《越绝书·宝剑篇》中提出古代兵器从石到玉到铜到铁的发展顺序及其作用来分析，“玉器时代”一词具有古代传说的成分，如“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林木为宫室”。但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提出“玉器时代”一词，又具有大量距今 4000 年以前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历史地分析“玉器时代”一词的提出及其讨论，实际上是近十多年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内涵之一，也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具有东方特征的一项基本内容。所以，研究距今 4000 年以前玉器的制作工艺、使用方式及其社会意义，以及玉礼器的出